

韓愈詩文在唐宋的整理刊行及其影響

趙飛鵬

國立成功大學

中文系

提 要

唐人詩文集，多經宋人整理、刊刻。宋人整理刊刻唐人詩文集，目的在於「學唐」，而後「變唐」。韓愈作為古文家與詩人，沾溉宋人極多，此與古籍整理、圖書流通關係至為密切。由北宋初至南宋末年，不斷有學人對於韓愈詩文從事文獻加工，影響所及，閱讀人口增加，學韓風氣普及，自是無庸置疑。而宋詩「以文為詩」、「奇崛孤峭」等的風格也應於焉形成。本文即以此為切入點，嘗試從唐、宋兩代對韓愈文集的整理，分析其對宋詩發展的影響，是一個跨學科整合研究的例子。

關鍵詞：韓愈、宋詩、文獻

一、前言

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直接關涉到當代的文風和思潮。文風和思潮的走向，往往決定古籍整理的門類，以及整理古籍成果的質和量。同時，古籍整理的成果經過流通傳播，自然產生回饋，激盪當代的文風和思潮，往往轉變創作的定向，影響學風和思潮。就宋代而言，由於古籍整理和文風思潮交相作用，彼此觸發，於是蔚為華夏文明的「登峰造極」。¹ 文獻整理與經學、史學、哲學、文學之交互反饋，兩漢以來代代有之，而於趙宋一朝，最為凸顯。

宋人對文獻整理的熱衷和投入，跟整個宋代圖書文化事業的發達，息息相關。經、史、文、哲文獻之搜集、整理、編年、箋注、評點，促進了宋代文學之學古通變，自成一家。因為在整理古籍、閱讀文獻之餘，出入去取之間，自然接受傳承了古籍的優長，既可新變風格，代雄前人，更可開發拓展自我之特色。古籍整理對文學風尚之形成，具有催化作用，這是顯而易見的。²

其次，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無疑是宋代文學發展中最重要的一個潮流。針對北宋初年「西崑體」的典麗風氣，與「太學體」的怪異文風，由石介、柳開、王禹偁等有志之士，起而反對，並推動詩文革新，直到歐陽修出現，才真正形成主流，徹底扭轉宋代文風。³ 反對西崑風氣的理論基礎是回歸儒家道統，標榜的典範人物則是韓愈。柳開說：

文章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

孫復說：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

穆修說：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寔而不雜。

石介的文集《徂徠集》卷五有〈尊韓〉一文，正式標舉韓愈為道統的繼承人：

道始於伏羲氏，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以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

1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245-246。

2 本文論點主要參考張高評先生，〈古籍整理與文學風尚——杜甫詩集之整理與宋詩宗風〉（「第三次兩岸古籍整理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2001年4月）。

3 主要參考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第四章；黃美鈴，〈歐梅蘇與宋詩的形成〉（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第二章。

師尊之，其智足以爲賢。……吏部爲賢人之卓。

王禹偁也說：

近世爲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

經過北宋古文家一致的推崇共尊，遂建立了韓愈不可動搖的地位。

宋代的詩文革新運動主要有如下兩項成就：

(一) 正式建立「文統」觀念。

韓愈撰〈原道〉一文，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道統」之傳，宋初柳開師承其意，開始建立「文統」觀念，並且將韓愈納入文統之列。他說：

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

又說：

迨年弱冠，野夫(柳開自號東郊野夫)深得韓文之要妙，下筆將學其爲文。……益堅古心，惟談孔、孟、荀、揚、王、韓以爲企跡。

因此，郭紹虞說：

宋初之文與道的運動，可以看做韓愈之「再生」，一切論調與主張無一不是韓愈精神之復現。這所謂韓愈精神之復現，最明顯的即是「統」的觀念。因爲有這統的觀念，所以他們有了信仰，也有了奮鬥的目標，產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進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績。⁴

(二) 奠定宋詩的發展方向與特色。

北宋前期詩歌的革新歷程，與古文運動的發展過程相似，革新派詩人的創作觀念也和古文家若合符節，強調「風雅美刺，經世致用」等現實主義傳統。甚至如王禹偁、蘇舜欽、歐陽修等人都是詩文兼擅的。不過北宋詩歌風格的演變與古文也有殊異之處，也就是取法杜、韓深窈奇崛的一面，遠離韓、柳古文坦易明暢的路子，在傳承變化唐音的基礎上，創造了與唐詩韻味迥異的「宋調」。自中唐以來，文壇習慣以「杜詩韓筆」稱許韓愈的古文，因此受到普遍重視，而他的詩歌，卻是到了宋代才真正得到知音。程千帆說：

由於歐陽修的提倡，以及他和他的伙伴們的創作實踐，宋詩的獨特面目和風格便逐漸形成，而宋詩的獨特面目和風格的形成，又是和學韓(包括學他的以文爲詩)分不開的。⁵

4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新論》(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85)，頁139。

5 程千帆，《韓愈以文爲詩說》，收在張高評先生主編，《宋詩綜論叢編》(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3)，頁309。

二、唐宋兩代韓愈詩文的整理與刊行

如上節所述，從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一開始，韓愈就已是眾人理想的典範，而韓愈文集則是學習的基礎，學韓的方法則是透過對韓愈詩文集的閱讀、注釋、評點、宣說以及刊行流布、造成風潮。由唐至宋，韓愈文集歷經多次集結刊行，今就其可考者纂述如下：⁶

（一）韓愈文集早在唐代，就有其弟子李漢在韓氏逝世不久所蒐集而成的本子，據其自序說：「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並目錄合爲四十一卷。」⁷以數量而言，與今存本相差不多。

（二）趙德《文錄》本。呂夏卿〈書文集後〉云：「丙申春，得趙德《文錄》六卷於林琪家。德，潮州人，文公爲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也。《文錄》所載皆韓文，自總七十五首，其次第淆亂，讀或有增損異同。疑德親受本於文公，比他本爲最可信者。」

趙德〈文錄序〉云：「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蓬次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寶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方崧卿云：「《文錄》舊六卷七十五首，今已不傳，而時得於諸家校本，惟潮本、浙本爲詳，然間有僞出。……第〈送楊之儀序〉及〈原毀〉等文，所載皆與閣本、舊本合，是亦不可誣也。」

（三）唐末令狐澄藏有咸通十一年（870）寫本，只有詩賦十卷。傳至宋初藏於蔡文忠（齊）家，後爲蘇魏公（頌）所得；南宋時，謝任伯曾據此本以校韓集（據方崧卿敘錄所引，其校勘年代爲「建炎三年（1129）」二月）。

方崧卿云：「頃嘗得謝本於聞人氏，大抵以古詩〈南山〉至〈歸彭城〉爲第一卷，餘與今次第同。……其所讎正，則令狐氏本、秘閣本是其所先，其間亦有所謂貞元本者。」

案：據方氏所說，可知在唐代韓愈文集已經有四、五種傳本，一直到南宋初年都還可以見到，足以證明韓文一直都受到文士的重視與保存，歐、蘇的古文運動乃是將其加以發揚光大、進一步取得主要地位。

6 主要參考業師潘美月先生，〈宋刻韓柳文集〉，《故宮文物月刊》，第3卷第2期（1985）；常思春，〈韓愈全集校注參校諸本并引據要籍敘錄〉，《韓愈全集校注》附錄（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韓愈資料彙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

7 引文見學海出版社編輯部編，〈韓愈資料彙編〉，頁36。

（四）宋太祖平江南，將所得圖籍賜翰林院保存，其中有保大間（943-957）寫本韓文，只有祭文、墓志數卷，但是其排列次序與前述唐本有異，當是別一本。

（五）北宋閣本。方崧卿云：「承平時閣下本，一時諸公得之於校讎之餘也。前輩如山谷先生、王仲至、鮑飲止所校，大抵皆以閣本爲正。……疑此本蓋公晚日所定，最爲可貴。」

（六）祥符杭本。方崧卿云：「杭州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所刊本，時尚未有外集，與閣本多同。……知此本最爲近古，頃嘗於姜秘監補之家得校韓文一帙，考訂頗密，亦以此本爲正，而參之已見。」

案：此本最值得注意的是由寺廟所刊行，可證推崇韓愈之詩文者，不僅是一般文士，就連出家人也同樣受其影響。而韓愈在唐代以反佛著稱，到了宋代，佛教徒卻刊印他的文集，也是頗堪玩味的事。

（七）嘉祐蜀本。方崧卿云：「右蜀人蘇溥慶曆間（1041-1048）所校，嘉祐中（1056-1063）刊於蜀，洪慶善之所謂蜀本，此也。韓文之有《集外篇》、有《音切》，自此本始也。第此本已經四校，故比舊集時有增損，然校之今本，則不侔矣。況四君子大儒，絕非妄肆胸臆者，故舊本之不通者，猶賴此本爲證。韓文古本題下皆有一首字，與《文選》同，此本多存之。《集外篇》今本脫誤殆不可讀，惟此本爲劉氏之舊。」

蘇溥〈書文集後〉：「益都所雕《昌黎先生集》，雖傳行久矣，文字脫爛，實難披閱，唯餘杭本稍若完正。慶曆辛巳（元年，1041）歲，溥求薦王府，時從兄渙以小著宰鄆陵，因即觀之，……比之杭蜀二本，其不相類者十三四。越明年，從兄復以故龍圖燁所增修本爲示，又且正千餘字，并獲《集外》三十八篇。又得嘉州李推官詡傳歐、尹二本，重加校勘。溥既拜厚賜，不敢藏于家，期與好古之士共之，乃募工鏤版，備於流行。其所增修字數及加音切，具諸目錄。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仍以河東先生後序附於末。謹跡傳授之自，庶信於人爾。時嘉祐六年（1061）六月旦。」

案：所謂四君子，即「河東先生（柳開）增修五千七百五十八字；龍圖劉燁增修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並音切一百七十二字；歐（陽修）、尹（洙）二學士修正六百八十一字。」見方崧卿《韓集舉正·敘錄》。

（八）柳開所得舊鈔本。宋代古文運動的首倡者柳開，也與韓文有一段淵源。吳曾說：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儷偶，自柳開變其風。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文

數十篇授開，開嘆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⁸
趙生所傳數十篇韓文，應該是單行鈔本。

（九）穆修自刊本。另一位古文運動早期的健將穆修（字伯長），爲了推揚韓文，還曾發生這樣一件軼事：

（修）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爲贈。」自是經年不售。⁹
這可能是宋代私人刊印韓集最早的記錄。

（十）歐陽文忠公校藏本。古文運動的代表人物歐陽脩，則是從青年時代開始就注意蒐集韓愈的文集。歐公〈記舊本韓文後〉說：

余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余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¹⁰

歐公所得六卷未說明誰人所刻，根據前引蘇溥本自序，可知在北宋時益都（今四川成都）確曾刊行韓集，歐公所藏者或即前述之劉燁本。¹¹

歐公不但勤讀韓文，對於韓愈文集還進行了嚴謹的整理。前引文又說：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

歐公所校之本，流傳頗廣，雖然歐公自己未曾付梓，但據歐本校訂刊印的本子卻不少，如前述的嘉祐蜀本、呂夏卿校本等。

（十一）洪興祖《韓文辨正》及《年譜》（張敦頤重刊本）。洪氏〈年譜序〉云：「顏之推云：『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信哉斯言！予校韓文，以唐本、監本、柳開、劉燁、朱台符、呂夏卿、宋景文、歐陽公、宋宣獻、王仲至、孫元忠、鮑欽止及近世所行諸本參定，凡諸本異同者兼存之。考歲月之先後，驗前史之是非，作《年譜》一卷，其不可以歲月系者，作《辨證》一卷。所不知者闕之。宣和乙巳（七年，1125）夏四月四日。」

8 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6），卷十，〈古文自柳開始〉，頁215。

9 《五朝名臣言行錄》，引自《新編中國文學史》（臺北：福記文化圖書公司，1985），頁631；案：魏泰，《東軒筆錄》卷三亦載此事，其所刻印者則作「柳集」，當是韓柳集並刊。

10 《歐陽脩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4），卷二十三，〈居士外集〉。

11 《直齋書錄解題》（北京：現代出版社，1987，「中國歷代書目叢刊」第一輯），卷十六，「韓集舉正」條作「劉燁本」。

張敦頤《書韓文後》云：「丹陽洪慶善，儒學淵藪也，嘗著《韓氏年譜》、《辨證》傳於時，學者復得以考正。然二書所傳未廣，余以所得其家本鏤版於昭武學，附《年譜》於正集之首，注《辨證》於正文之下。」

案：洪興祖（1090-1155），字慶善，號練堂，鎮江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官至饒州知州。《宋史》本傳未著錄此書，可知其流傳確實較少。

（十二）淳熙元年錦溪張監稅宅刊本。案：此書原為沈氏研易樓舊藏，今貯故宮博物院，存三十六卷，即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注》著錄之「北宋槧小字本昌黎先生集」，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卷十二考訂為南宋紹興中刊本。昌瑞卿師據後序及牌記定為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錦溪張監稅宅翻刻紹興九年廣東潮州官本，潮州本又源出北宋大觀初刊本，並稱讚其價值：「此帙雖亦殘闕六卷，然仍為存世卷帙最富之帙，且為方崧卿、朱文公所未嘗參校者，其寶貴當何如哉！」¹²又國家圖書館藏有殘宋本二卷（卷三九、四十）。

（十三）韓醇《詁訓唐昌黎先生文集》五十一卷。案：《天祿琳琅書目》卷三：「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共五十一卷。前載唐李漢序。是書惟卷一下標臨邛韓醇四字，前後俱無序跋。考之《宋史》不載醇傳，按宋刊《五百家詁訓昌黎文集》列諸儒名氏，載醇字仲韶。又《詁訓柳宗元集》亦出醇手，書後有醇記，作於孝宗淳熙丁酉（四年，1177），稱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為之詁訓云云。則醇為愈之裔，可知其家在臨邛，當即為蜀中所刊。」

（十四）方崧卿《韓集舉正》。方氏〈後序〉：「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目錄一卷、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增考年譜一卷。……因復次其異同，記其訛舛之自，為《舉正》十卷，使人開卷知所自擇，而韓氏義例亦粗見於綱領中。」

案：方氏此書為宋人整理韓愈文集最有系統，成就最大者。此書以南宋監本為底本，據以校勘者有金石書三種、石刻拓本十七種、唐寫本一種、北宋刊本四種、《文苑英華》、《唐文粹》等，部分參校之版本尚有三十多種，可謂引證繁富。此書後收入清修《四庫全書》，國家圖書館藏有影宋鈔本。

方崧卿（1135-1194），字申季，福建莆田人，隆興元年進士，官至京西轉運判官。¹³

（十五）朱熹《韓昌黎先生集考異》。朱子〈書韓文考異前〉：「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為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

12 昌彼得，《增訂蟬庵群書題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255。

13 陸心源，《宋史翼》（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二十一。

之意，又他本所無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閣本爲定，而尤尊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知曉。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

案：據此可知朱子之書乃針對方崧卿《韓集舉正》而作，然而朱子所考亦未必盡當，且其所採與方書合者十之六七，實不足以取代方書。又朱子原書有紹定二年（1229）張洽刊本，後世傳抄覆刻者甚希。

（十六）魏仲舉輯五百家注本。案：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收有影宋本《新刊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係南宋慶元六年（1200）所刊，正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序傳碑記一卷、韓文類譜十卷、朱子韓文考異十卷。目錄後有牌記云：「慶元六禩孟春建安魏仲舉刻梓於家塾」。此書《天祿琳琅書目》卷三著錄，清末藏於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四著錄，民國後歸於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今貯藏於國家圖書館。魏氏同時刊有《柳集》，據其書前引用書目注云：「仲舉名懷忠。」

（十七）文謙詳注王儔補注本。案：此書全名《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集》，凡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三卷，二十八冊，清末藏於楊氏海源閣，今貯藏於北京圖書館。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二著錄，云：「字兼顏柳，瘦勁有骨，爲蜀之眉山刻本。」書前有「迪功郎普慈文謙詞源詳注，通直郎致仕淡齋王儔尙友補註」署名，知爲文、王二人之作。

（十八）祝充《音註韓文公文集》。案：此書凡四十卷，外集十二卷，十六冊，今貯藏於北京圖書館。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五著錄，據魏仲舉刊本考知爲祝充音註本，並據書中避諱字考訂爲南宋光宗紹熙間刊本。

（十九）王伯大音釋本。案：此書全名《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遺文一卷，書前有朱子序，王伯大序。王序云：「郡齋近刊《朱文公校定昌黎集》，附以《考異》，而《音辯》則舊所刊也。初讀者未免求之音辯，質諸校本，既字不盡同，且音訛，事多缺。此書有集註、有補註、有辨證、有全解，音通句釋，引物連類，雖若加詳，而於本文間亦牴牾，余頗病之。今悉從校本更定音訓，因旁摭諸家註解勘本文用事者，枚舉而記。其凡有未備，則訪諸士友博極此書者，併記之。……寶慶三年（1227）季夏王伯大謹書。」

又案：朱子撰韓文考異，原本十卷，於韓集外別行。其體例不載全文，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以所考夾注於下，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至宋末王伯大以考異在本集之外別爲卷帙，不便尋覽，乃離析考異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重爲編次，刻於南劍州。其據各本所作音釋則仍置於各篇之末。其後建陽麻沙書坊又將

音釋散入諸句之下，便於讀書檢閱，後世多從之。此書元明以後覆刻者甚多，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九著錄有宋刊本。

王伯大（?-1253），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宋史》卷四二〇有傳。

（二十）臨江軍學刊本。案：此書全名《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南宋紹定六年（1233）臨江軍學刊本。北京圖書館藏有殘宋本兩部：一部存三卷（卷十三、十四、三六），一部存二卷（十五、十六）。¹⁴

（二十一）廖瑩中世綵堂刊本《昌黎先生集》。周密《志雅堂雜抄》卷上：「廖瑩中群玉，號藥州，邵武人（今福建省），登科爲賈師憲平章之客。」卷下：「瑩中所刻書，始於景定（1260-1264）。先開《福華篇》，備載江上之功。……其後開《九經》，凡用十餘本對定，各委本經人點對，又圈句讀，極其精妙。……所開韓、柳文尤精好。」

案：廖瑩中之名附見《宋史》賈似道傳，事跡略見於陸心源《宋史翼》卷四十。廖本正文依朱子《考異》，校文亦悉用《考異》，朱子則本之方氏《舉正》而刪去所據之各本名稱及諸家姓名，廖本亦同。此書《持靜齋書目》卷四、《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卷一均有著錄，清末藏於楊氏海源閣，民國十二年曾有上海蟬隱廬影印本行世，今貯藏於北京圖書館。

（二十二）其他宋代傳本。根據前引魏仲舉刊本所列引用諸家名氏，以及參考各家藏書目錄、現存各大圖書館藏書目錄，宋代曾經流傳的韓愈文集，尚可補充如下：

1. 樊汝霖《韓集譜注》四十卷。
2. 孫汝聽《韓集全解》。
3. 嚴有翼《韓文切證》。
4. 南宋刊白文本《昌黎先生文集》存卷一至卷九。
5. 南宋刊《昌黎先生文集》存第十卷（有簡注）。
6. 南宋刊白文本《昌黎先生文集》存卷十一至卷十六。

案：以上三種宋本爲清末翁同書所集韓文殘本，共有三種不同版本，版式、內容均有異。今貯藏於北京圖書館。

7. 方崧卿《舉正》引用諸家：

- （1）謝任伯校本。
- （2）李漢老校本。

14 此本是否即前述之張洽刊本，待查。此處所據爲《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集部（北京：北京圖書館，1987）。

(3) 董彥遠《韓文考》。

(4) 姚令威《韓詩注》。

8. 洪氏《年譜》引用諸家：

(1) 朱台符本。

(2) 呂夏卿本。

(3) 宋景文（祁）本。

(4) 宋宣獻（綬）本。

(5) 王仲至本。

(6) 孫元忠本。

(7) 鮑欽止本。

三、韓愈詩文對宋詩的影響

由上節所述可知韓愈詩文集在北宋、南宋都有許多人從事整理、注釋、印行，其刊行區域也由北到南，幾乎遍及全國。也可從此推知閱讀、學習韓愈風格的人一定更多，對於宋人詩歌創作，造成深遠影響。

韓愈詩文集的整理刊行，對於宋詩的影響至少可分為以下兩項論之：

（一）效法韓詩風格形成「歐梅詩派」。

宋初石介等人，或因地位不顯，或因性格剛烈、忤時遭忌，¹⁵又缺乏夠份量的創作，使他們推動的復古行動並未造成風潮，此後繼承者是尹洙、蘇舜欽、梅堯臣等，而代表人物是歐陽脩，才逐漸推廣宣揚詩文革新的觀念，終於完成這一運動。

歐陽脩之所以能夠領導古文運動的成功，有多種因素：¹⁶

1. 掌握「知貢舉」的有力工具。
2. 創作詩文一絲不苟，為士子所效習。
3. 塑造簡易平淡的風格，指出學習門徑。
4. 胸襟寬闊，善處人事，有助於革新運動之推展。
5. 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形成詩文革新的文學集團。

宋代詩人中即以歐陽脩倡導學韓最力，他說：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余獨愛其工於用韻也。

15 如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穆修「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皆是。參見何寄澎，《北宋的古文運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第四章。

16 同上註。

又作詩稱讚韓愈說：

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篇章綴談笑，雷電擊幽荒。眾鳥誰敢賀？鳴鳳呼其風。孟窮苦累累，韓富浩穰穰，窮者啄其精，富者爛文章。發生一爲宮，拏斂一爲商，二律雖不同，合奏乃鏘鏘。¹⁷

後人評論歐詩，也指出歐公因爲重視推崇韓愈，在詩文創作方面，經常有意模仿，¹⁸如：

陳善《捫蝨新語》卷二：

韓文公嘗作〈赤藤杖歌〉，歐陽公遂每每效其體，作〈菱溪大石〉；公又有〈石篆詩〉、〈紫石硯屏歌〉、〈吳學士石屏歌〉，此三篇亦前詩之意也，其法蓋出於退之。

何汶《竹莊詩話》卷九引《延漏錄》云：

予嘗以師禮見參政歐公脩，因論及唐詩，公謂韓退之才可及，而每學之。故今歐詩多類韓體。

李治《敬齋古今註》卷八：

歐陽永叔作詩，少年時頗類李白，中年全學退之，至於暮年，則甚似樂天矣。

而歐公的同志梅堯臣、蘇舜欽等繼起，乃至江西詩派的出現，逐漸形成宋詩獨特的風貌。全祖望說：

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慶曆以後，歐、蘇、梅、王諸公出，而宋詩一變；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詩派者，而宋詩又一變。¹⁹

(二) 正式完成宋詩「以文爲詩」之特徵。

「以文爲詩」是宋詩創作上非常重要的特色。所謂「以文爲詩」，具有以下幾項涵義：一是指以散文的句法作詩；二是大量使用虛字；三是以古文之章法爲詩；四是多議論。²⁰此一特色雖然在杜甫的詩歌中已經甚爲明顯，宋人學習的主要來源，則是韓愈。²¹魏慶之《詩人玉屑》引蘇軾說：

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

17 引文見《六一詩話》（北京：中國書局，1994），頁1035；《居士集》（北京：中國書局，1994），卷二，〈讀蟠桃詩寄子美〉，頁15。

18 引文並見《歐陽脩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19 〈宋詩紀事序〉；《鮚埼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外集卷二十六，頁1246。

20 黃美鈴，《歐梅蘇與宋詩的形成》（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第二章。

21 「以文爲詩」並不始於唐詩，但是有意識的援用並且大量創作，則是始於杜、韓。參見吳小如，〈宋詩漫談〉，收在張高評先生主編，《宋詩綜論叢編》，頁7-8。

趙秉文說：

杜陵知詩之爲詩，而未知不詩之爲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²²

趙翼說：

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辭，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²³

然而對於「以文爲詩」這一藝術手法，宋人當時的評價已經並不一致，例如陳師道《後山詩話》引黃庭堅說：

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陳師道自己也說：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²⁴

陳善說：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自要有詩，詩中自要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²⁵

兩人之說可以代表正反雙方意見。魏慶之《詩人玉屑》記載了一個故事：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論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責難，久而不決。²⁶

無論贊成或反對意見如何，由此看來，「以文爲詩」至遲在北宋中葉，已經成爲詩學理論範疇中極爲重要的觀念，對於詩人的創作風氣，也形成深刻的影響。

吉川幸次郎說：

首創宋代詩風的北宋歐陽修，已有「以文爲詩」的傾向，或者正因爲他是開風氣之先的人，所以這種傾向也就表現得更爲顯著。²⁷

從歐公之後，「以文爲詩」就成爲宋詩中一個普遍的特色。

22 《閑閑老人滄水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卷十九，頁600。

23 《甌北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71），卷五。

24 《後山詩話》（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頁168。

25 《捫蝨新語》（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上集卷一，頁263。

26 《詩人玉屑》，卷十五，引《臨漢隱居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頁263。

27 《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頁15。

四、結 論

古籍整理工作，從編纂、輯佚、考訂、註解；到編年、分類、評點，牽涉到文獻考據和文學批評的課題。至於傳鈔、刊刻、閱讀、詮釋、創發，則是版本流傳、文學接受、讀者反應的活動。這一系列的文學讀解活動，牽涉到文學閱讀的價值取向，和讀者的期待視野，構成了所謂「心理定勢」。心理定勢在文獻整理的推助下，更逐漸表現為一種好惡和取舍的閱讀態度，形成「證同」和「趨異」兩種審美傾向。²⁸ 文獻整理與文學風尚之互動，由此可見。

宋代詩人「學古」對象雖然各有不同，²⁹ 大抵皆以形成自家詩學典範為依歸。選擇典範之過程，必先熟悉歷朝優秀詩人及其作品，其可能之途徑有四：其一，借閱藏書，純粹當一名讀者；其二，傳鈔善本，藉鈔書完成閱讀；其三，整理文集，利己利人；其四，雕版印刷，流傳廣遠。後三者關係圖書流通與古籍整理，對於宋人之典範選擇，不僅有交互之作用，相輔相成之效果，更有推波助瀾，百川歸海之效應。

唐人詩文集，多經宋人整理、刊刻。宋人整理刊刻唐人詩文集，目的在於「學唐」，而後「變唐」。韓愈作為古文家與詩人，沾溉宋人極多，此與古籍整理、圖書流通關係至為密切。由北宋初至南宋末年，不斷有學人對於韓愈詩文從事文獻加工，影響所及，閱讀人口增加，學韓風氣普及，自是無庸置疑。而宋詩「以文為詩」、「奇崛孤峭」的風格也於焉形成。

宋詩典範的追求與取舍，與古籍整理的質量、圖書版本流通的廣狹，存在彼此激盪，相輔相成的關係，值得繼續研討。筆者近年來賡續進行此一專題系列之研究計畫，本文是部分成果，借此次研討會提出，並請方家先進指正！

後記：本文在「宋元善本圖書學術研討會」提出後，承蒙恩師 潘美月先生講評，指示缺失；吳哲夫先生、王國良先生也提供寶貴意見，都已經遵照修正。張高評先生會前惠借資料，並慨允引用其論文之觀點與文字，惠我良多。以上諸位師長先進的協助，特別在此鳴謝！

（本文為「宋元善本圖書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年12月17、18日。）

28 龍協濤，《文學解讀與美的再創造》（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3），第六章，〈文學閱讀的心理定勢〉，頁212-238。

29 參考蔡啟，〈宋初詩風〉，《蔡寬夫詩話》，第43則；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元方回，〈送羅壽可詩序〉，《桐江續集》，卷三十二；（清）宋華，《漫堂說詩》、全祖望，〈宋詩紀事序〉，《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Han Yü's Works in the T'ang and Sung Periods, and their Subsequent Influence

Chau Fei-pa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compilations of T'ang poetry and literature were printed during the Sung, intended as a means to both study and emulate the works of that period. Han Yü, a scholar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a poet in his own right, was very much favored in the Sung, a fact of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se editions. Throughout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eras, a great deal of Han Yü's oeuvre was published, a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enjoye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and reached a large audience at this time, or that his writing style came to be known far and wide. Furthermore, the style of poetry prevalent in the Sung owed no small debt to his influence. This paper will seek to analyze the compilations published of Han Yü's works during both the T'ang and Sung periods and thereby establish the impact he ha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ung poetry.

Keywords: Han Yü, Sung poetry, literature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1 to 24.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11 by Paul Cooper.